

县域亲代抚育的恢复*

——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抚育方式的转变机制

欧阳杜菲 刘 能

摘 要：近年来，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回流至家乡所在的县域，这些农民工家庭的抚育方式从隔代抚育恢复至亲代抚育。本文通过对中部 T 县的案例研究发现，教育城镇化、产业向中西部县域转移和抚育观念的代际革命是抚育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机制。在城乡融合的县域社会中，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抚育地点地理等级的提升以及抚育观念的革新，也预示着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培育既不完全脱离乡土，又能适应城市文明的新人，从而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的城镇化。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 农民工回流 亲代抚育 隔代抚育 抚育观念

一、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构成单元，抚育子女是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传统意义上，家庭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配合深受地域限制，尤其是抚育子女需要夫妇的亲密合作与共同生活（费孝通，1999：70）。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农民为谋求更多的经济收入选择外出务工，家庭生计与

* 本文曾在中国社会学会 2023 年学术年会“第四届县域社会学”论坛宣读，感谢董磊明老师和焦长权老师的宝贵意见。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指正。文责自负。

子女抚育被拆分在城乡之间。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民工开始返回家乡所在县域就业，农民工家庭的抚育方式得以从隔代抚育恢复至亲代抚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生计与子女抚育在县域内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再整合。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出口导向型的加工制造业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发展，加之国家逐步打破城乡和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以大量“60后”“70后”为主体的中西部青壮年农民纷纷涌入东南沿海城镇寻求发展的机会。这种远距离的迁徙和流入地对随迁儿童的教育壁垒冲击着传统的父母双系抚育模式。很多农民家庭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做出了年轻夫妇进城务工，孩子由留在农村务农的老人进行隔代抚育的安排，^①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夏柱智、贺雪峰，2017）和“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沈原，2006）。

2010年以来，中西部县域城镇化加快发展，中西部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再选择远距离“候鸟式”地在城乡间循环迁徙，而是回流到家乡县域，这些农民工家庭的抚育方式也由隔代抚育恢复至亲代抚育。从农民工家庭的生命周期来看，中西部农民工通常面临外出谋求更多收入与亲自在乡抚育子女的两难选择。许多农民工家庭为了生计都经历过隔代抚育阶段，但在隔代抚育阶段的时间长短与恢复亲代抚育的时间节点上，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存在很大不同。无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在结婚前就外出务工，待到结婚后妻子怀孕，丈夫会继续在外地务工，妻子则多回乡待产。在孩子分娩后，妻子把孩子带到多大再外出务工、外出务工后等孩子多大再回乡，不同代际的农民工家庭则出现了明显分化。^②中西部老一代农民工大多在孩子一两岁甚至几个月大时就外出务工，在孩子中考或高考前一两年的关键升学期回乡陪读。近年来，中西部一批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将家乡的县城作为兼顾家庭生计与子女抚育的长

① 本文中的“隔代抚育”仅指父母不在孩子身边、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为孩子主要照料人的抚育方式。“亲代抚育”指父母一方或双方与孩子共同生活、为孩子主要照料人的抚育方式，其中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可能参与协助抚育。因此，隔代抚育与亲代抚育并非截然区分，而是表现为父母在抚育活动中参与程度的不同。

② 为避免讨论过于复杂，本文暂不讨论将子女随迁到县域外务工地的农民工家庭，只讨论因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带来的隔代抚育和父母双方或一方回乡使子女在县域内恢复亲代抚育的农民工家庭。

期扎根之地，尽可能缩短隔代抚育的时间。他们在孩子小学或学龄前阶段就恢复亲代抚育，甚至自孩子出生后就不再到外地务工。那么，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中西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何更倾向于在孩子成长早期就回流至家乡县域以恢复亲代抚育呢？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迅速发展。城镇常住人口占比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22年的65.22%，农业从业人口占比则相应从70.53%降低至24.08%（国家统计局编，2023：31、121）。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刘守英、王一鸽，2018）。这一城镇化进程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周飞舟等，2018）。就人口城镇化而言，中国只走完了城镇化的“上半程”，即农民仅在就业和收入上“挣脱”了乡土，他们依旧在城乡间“候鸟式”流动。近年来，中国城镇化正在开启“下半程”，即农民工重新在家乡所在的城乡空间体系中沉淀下来，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农民工回乡在县域落地安家（焦长权，2022）。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从追求收入增长的跨地域迁移的市场性流动，转向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式就近迁移的社会性流动（刘建娥、凌巍，2023）。

持续规模化的流动已成为推动中国农民家庭变迁的重要力量。很多农民家庭因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分散流动而呈现离散化的特点，但空间上的离散并不意味着家庭的解体，多数家庭通过一系列适应、维持和修复行为，顽强地维系着家庭的基本功能，构造了一个跨越城乡的弹性家庭生活模式（金一虹，2009）。中国农民家庭在面临现代化压力时，并非由传统扩大家庭转向现代核心家庭，而是形成了围绕家庭目标强化代际整合的新家庭主义（Yan，2018）。

随着城镇化的演进，农民家庭在持续的城乡流动中呈现的弹性家庭生活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迁。在城镇化的上半程，农民进城务工或经商是为了解决较为紧迫的生存问题。随着城镇化进入下半程，农民家庭的目标转变为通过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来实现阶层跃升。农民家庭由此出现了“一家三制”的弹性结构，即年轻男性在大城市务工，年轻女性回流

县城或乡镇陪读，老人留守农村务农，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基础上叠加了“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伴读”（李永萍，2022；刘超，2022；张一晗，2022）。

沿着上述研究路径，许多研究聚焦于亲代陪读，探讨弹性家庭生产—生活模式转变的原因。亲代陪读现象兴起于2000年前后，2010年以来尤为盛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是陪读的主体。早期的陪读多出现在少数经济条件较好和文化资本较多的乡村精英家庭，近年来，陪读日益走向大众化，并从阶段性陪读向全周期陪读转变（王文龙，2012；杨华、雷望红等，2023：162）。陪读最初被视为农村撤点并校政策的产物（李龙、宋月萍，2015；庞晓鹏等，2017）。有学者基于县域教育“供给—需求”匹配的视角指出，陪读的兴起本质上是因为县域教育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家庭对教育的需求、既有的家庭分工以及教育能力不匹配（齐薇薇，2022）。这些研究对陪读的兴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无法解释为何在县域教育公共品配套逐渐完善后，陪读仍然会愈演愈烈，并逐渐成为农民家庭的主动选择。

另一些研究将陪读置于教育城镇化与阶层分化的社会情境中加以理解，将陪读视为农民为实现家庭阶层跃升而主动采取的策略。在教育城镇化的浪潮中，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旦从相对均质的乡村教育进入城镇教育，就踏入了一个层级分明、竞争激烈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学校被分层，学生也被分层，学校是一种阶层性价值的投射（林小英，2023：vii、82）。有学者认为，陪读是农民家庭为了获得阶层流动而进行的教育风险投资，农民家庭通过牺牲陪读者的劳动价值和家庭资源来换取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雷望红，2018）。越是处于中下阶层的农民工家庭，越有可能通过时间、精力和情感的高度投入，力图达到城市中产阶层的教养效果（王旭清，2022）。这类研究基于社会阶层流动理论，仅仅将家庭成员视为实现家庭整体目标的工具，无论是陪读者还是被陪读的孩子，都如“提线木偶”一般，被一个高高在上的家庭阶层跃升目标所牵引。然而，能够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只是其中少数人，为何农民工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进行陪读呢？

当农民面对外在于结构变动时，并非仅凭利益算计做出被动反应，他们的行动背后亦有一套观念基础。有学者尝试进入家庭内部行动主体的意义世界探究亲代陪读的伦理意涵。例如，周飞舟与宋丹丹（2024）对回乡陪读母亲的研究试图跳出城乡和阶层的解释路径，转而将陪读视为一种抚育

方式。他们指出，密集母职的抚育实践具有超越城乡和阶层差别的普遍性，需要从根本上探讨母亲们观念世界中有关陪读的行动意义。这一研究发现，母亲为了子代的未来回乡陪读是中国社会家庭中心观的一种显著表现。就回流的节点而言，母亲在做出回乡决策时，通常会面临家计和抚育的两难处境，为了顾全家计，家庭中的祖辈成为承担抚育责任的首要人员，等到孩子到了初中和高中的“关键时期”，母亲会回乡陪读。只有祖辈无法提供足够的隔代抚育支持时，母亲才会在“关键时期”之前回乡。一旦回乡，她们就会展开密集看护式的抚育。这一研究对笔者有很大启发，但其未能完全回应我们在田野中观察到的现象，即很多在孩子上初中之前父母就回乡的家庭，祖辈并非在体力和精力上无法承担抚育责任。那么，为何这些祖辈能够提供隔代抚育支持的家庭也要转变抚育方式呢？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综合以上研究，本文尝试将亲代陪读视为一种抚育方式的转变。在中西部县域城镇化的背景下，本文以湖南省西北部的T县^①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为案例，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视角出发，通过对家庭内祖辈隔代抚育与父辈亲代抚育的比较，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父母在子代成长早期恢复亲代抚育的原因。本研究从结构变迁与观念革新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尝试回答隔代抚育在教育城镇化的进程中遭遇了哪些结构性困境，以及县域承接产业转移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提供了怎样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尝试阐释长期浸润在城市生活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抚育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观念的变化又如何使他们迫切地恢复亲代抚育。

三、研究方法 with 田野概况

本研究采取实地调查方法，调查地点是湖南省西北部的T县。该县是一个人口大县，近年来县域城镇化进程极快。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T县2020年的常住人口为80.9万，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34.6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2.76%。相较于2010年，城镇人口增加了11.9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16.14个百分点。

^① 本文已对经验案例可能涉及的县及以下的地名、人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除城镇人口增加外，T县在教育 and 产业上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型。一方面，T县加快推进教育城镇化。以2017—2022年学生城乡分布变化为例，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城镇化率从61.21%提高至89.15%，教育城镇化的速度已远远超过人口城镇化。就本文重点考察的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学生在县城的集聚程度而言，短短五年，县城幼儿园学生从4199人增加至4639人，占全县幼儿园学生的比重从20.11%上升到25.29%，提升了5个百分点；县城小学生的增加幅度更大，从10328人增加至14867人，增加了4539人，占全县小学生的比重从21.5%上升到31.08%，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①县城新增的幼儿园及小学生人数绝大部分来自该县的农村地区，且以亲代在县城买房或租房陪读为主。另一方面，T县积极承接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T县原本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农业县，工业基础薄弱。2010年以来，许多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进驻T县。截至2022年底，T县高新区共有企业28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34家，吸引了大量农民工从东南沿海地区回流县城。

基于县域教育城镇化与承接产业转移的背景，本研究选取T县高新区从东南沿海地区转移而来的华炎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炎电子厂”）展开案例研究。该厂于2021年8月正式入驻T县高新区，2022年共有员工297人，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其中绝大部分员工是来自T县本地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女工，月工资水平在3000~5000元。笔者于2022年7月、2023年2月和2023年8月先后三次调研华炎电子厂，累计调研时间20天，共计访谈15人。第一次调研围绕家庭抚育问题深度访谈了10位新生代农民工。第二次调研对这些农民工进行了追访。第三次调研又以滚雪球的方式访谈了5位在县城其他工厂或门店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三次调研共计调研了15个家庭。笔者也参与观察了部分家庭的抚育实践。

这15个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绝大部分在孩子上小学或幼儿园阶段恢复亲代抚育甚至有的自孩子出生就采取了亲代抚育。15位受访者中有14个“80后”、1个“90后”，12个母亲、3个父亲，受教育水平以初中或中专为主，孩子的数量为1~2个。其中，有7个家庭在父母回流之前，孩子由老人在农村进行隔代抚育，在孩子上小学或幼儿园阶段，母亲从东南沿海

^① 2017—2022年T县学生数据根据T县教育局计划财务股提供的年度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得出。

城镇返乡恢复亲代抚育，部分家庭的父亲一同返乡。有5个家庭自从孩子出生就进行亲代抚育。有3个家庭是在孩子初中、高中乃至大学阶段，新生代父母才回流家乡县城，这些父母的生育时间相对较早，孩子的祖辈较为年富力强，且都只生育1个孩子，这3个家庭构成了我们研究的对照组。总体而言，以上15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处于县域中等水平，通常需要夫妻双方都参与工作才能维持家庭生计。由于县城是就业机会与优质教育公共服务的聚集地，因此夫妻双方或一方多选择回到县城就业，并将孩子从农村接到县城接受教育，兼顾家庭生计与子女抚育。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恢复亲代抚育的原因是本研究考察的重点。

四、隔代抚育的结构困境

虽然学界倾向于从“亲子分离”出发，将农村留守儿童视为一个社会问题，将隔代抚育视为一种反常的抚育形态（段成荣、周福林，2005），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有研究发现，采取隔代抚育的老一代农民工家庭并未将隔代抚育视为问题，其中，认为隔代抚育不存在问题的父母大约占47.3%，另一部分父母认为隔代抚育的问题主要是孩子的祖辈难以辅导和监督留守子女的学习，但他们总体上对祖辈抚育较为满意和放心；祖辈也大多认为自身除无法胜任孩子的学习辅导和监督外，在生活照料和安全看护上与亲代抚育相差无几（叶敬忠、潘璐，2008：300-302、325-327）。

新生代农民工的孩子恰逢近二十年来的教育城镇化浪潮，这一浪潮推动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抚育地点从乡村进入县城。这使隔代抚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首先，县城的生活方式迥异于乡村，祖辈进入县城后面临生活方式适应困境。其次，祖辈进入县城陪读影响了祖辈在乡村的农副业生产，冲击了家庭原有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最后也更为关键的是，教育城镇化推动了城市流行的家校共育模式向农村家庭蔓延，祖辈因认知与知识水平的局限难以适应家校共育的要求。由于隔代抚育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下面临上述困境，新生代农民工若想把孩子送入县城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通常只能缩短隔代抚育的时间，及时回流县城恢复亲代抚育。

（一）生活方式适应的困境

农民由乡村进入县城生活意味着一整套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一，农民生活的空间范围从村庄或基层市场体系扩大到县域，他们需要使用更为现代化的交通与通信工具。其二，农民生活从相对自给自足变得高度商品化，县城生活的日常所需几乎都要通过市场来满足，农民家庭经济压力显著增加。其三，农民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既要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又要适应一套不同于亲密社群的社会规范与交往逻辑。

新生代农民工的父母能否适应县城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进城务工的经历。新生代农民工的父母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因时代变迁与家庭分工不同，他们务工的城镇等级和时间长短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其中，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农民，大多没有或仅有短时间的进城务工经历，通常较难适应县城生活。刚进入华炎电子厂工作不久的彩云自从2010年结婚后就没再外出务工，女儿2011年出生，她和丈夫一直在县城工作，亲自抚育女儿。当问及为何不是让孩子的祖父母进城抚育，他们去沿海地区务工时，她谈到，“公公婆婆七十多岁了，在乡里待习惯了，他们之前没有在城里生活过，来城里会觉得不自在”（20230210 彩云）。在乡村“习惯了”和在城里“不自在”是这些没有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民对城乡生活方式差异最真切的体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民若进城务工时间相对较长，则更有可能适应县城生活，并开展隔代抚育。我们在调研中就遇到了一个由祖母在县城抚育孙女的案例。“80后”若妍的女儿自幼儿园起就在县城的私立学校读书，由女儿的祖母独自抚育，祖母是“60后”，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丈夫一同到东莞务工。

妈妈虽然没有读多少书，但很有能力。我生下女儿，停薪留职一个多月后就回厂里工作了，由妈妈专职带孩子。她在（东莞）这个镇上待了几十年，对大街小巷都熟悉，带孩子不成问题。听说我们县城有一所私立学校办得不错，妈妈就带着女儿回县城读私立幼儿园了。她在县里还能一边带孩子，一边打零工。（20220722 若妍）

这个案例中的祖母是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的特例。首先，她和她的儿媳生育都相对较早，孙女出生时她才46岁，年富力强，完全能长期胜

任隔代抚育的任务。其次，长达二十多年在东南沿海地区务工的经历让她积累了丰富的城镇生活经验，这些经验为她回到家乡后能较快适应县城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基础。最后，她能在抚育之余进入县城的非农就业市场，带来家庭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的祖辈往往难以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因此无法游刃有余地适应县城的生活方式。

（二）生计基础调适的难题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父母来说，县城的生活方式尚可逐步适应，生计模式的调适则是更大的难题。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原本多采取“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老一辈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参与家庭生计。正是老一辈的女性在家中操持家务，男性才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农副业生产。当老一辈的女性从农村家庭中抽身进入县城陪读后，不仅她自身无法继续从事农副业生产，还会影响其丈夫的生产活动乃至日常生活。

“80后”的泽晖与妻子原先都在广州务工，但为了女儿能够在T县城区一所较好的公立初中接受教育，最后都回到了T县。他们原本都不想放弃广州的高薪工作，希望孩子的祖母能到县城照顾女儿，但祖母以生计为由推辞了。孩子的祖父长年在农村种地、做豆腐、干建筑小工，祖母则在家操持家务，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祖母担心自己去了县城，祖父无人照顾，这些营生都会受到影响。最后，泽晖和妻子不得不辞掉广州的工作回来照顾女儿。

由此可见，小孩的祖辈进城陪读可能会使老人在县域城乡两地分居，打破原本配合良好、功能互补的生计和生活状态。祖辈在乡村的生计基础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带孙辈，这既是为自己挣养老钱，也是为子女减轻赡养负担。祖辈若是进入县城带孙辈，则意味着他们需要舍弃一部分生计来源，这会使家庭收入明显下降，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有学者发现，在大城市的郊区农村出现了中老年女性工作日进城帮助子代料理家务和照顾孙辈，周末回到村庄与丈夫一起生活的“周末夫妻”现象，以此来缓和由家庭拆分带来的功能失调（李永萍，2020）。在中西部县域，新生代农民工若不回流照顾自己的子女，老人有一方就需要长期在县城陪读，老年夫妇连做“周末夫妻”都难以实现。

（三）家校共育模式的挑战

即使祖辈进入县城后经过一番调适克服了家庭生活方式和生计模式改变所带来的各种困难，他们仍难以适应县城家校共育的新型教育模式。“教育进城”前，农村儿童在学龄阶段后接受的教育以老师教导为主，祖辈主要负责孙辈的居家生活照料与安全看护。在教育进城后，学校教育的激烈竞争将家长卷入其中，家长需要深度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

家校共育的模式发轫于县城优质学校与中上层家庭的“合作”。一方面，县城优质学校积极鼓励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并提供各种渠道提升家长的参与能力。如T县最好的江澜小学鼓励家长来校讲课，定期组织家长培训，举行“书香家庭”评比，等等。另一方面，县城中上层家庭小孩的父母多为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和较多的闲暇时间，是家校共育模式的支持者。因此，县城优质学校与中上层家庭形成了家校共育、双向促进的局面。

家校共育模式在县城形成示范效应，逐渐从优质学校向普通学校扩散，从中上层家庭向中下层家庭蔓延。以T县城区招收了大量农民工子弟的文兴小学为例，学校将家校共育模式覆盖至全体学生。教师通过各种线上通信软件与家长建立即时联系，将作业（包括阅读、体育等打卡活动）与考试成绩等告知家长并向家长了解学生情况。与此同时，家长也主动加大对子女家庭教育的投入，如积极辅导课后作业、检查作业甚至给孩子布置额外的学习任务，等等。

然而，对承担隔代抚育的祖辈来说，他们却难以适应家校共育的模式。第一，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已成为家校共育的必备工具，但祖辈对新技术与新知识的掌握相对滞后，存在数字鸿沟。第二，家校共育高度依赖家长与教师的互动，由于祖辈与教师存在年龄差和知识差，无法与教师顺畅自如地交流互动，因而难以达成有效的教育合作。第三，祖辈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较难甚至无法辅导孩子的学业。永君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刚开始小孩没有上学时，我不能到沿海地区打工。现在小孩上学了，我也不能到沿海地区打工。因为学校有很多事情都需要在手机上操作，比如填个表、打个卡，老人根本不会。（20230206 永君）

我不会用那些，怕自己做错了被年轻人笑话。我也没什么文化，辅导不了作业，还是媳妇回来自己带孩子更方便。（20230206 永君的婆婆）

由此可见，若祖辈进入县城陪读，不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生计基础会面临多重冲击，而且他们还会遭遇难以适应家校共育模式的困境。虽然有些祖辈在县城陪读，但仍只能承担接送孩子、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通常在孩子从农村到县城上学之后，选择从东南沿海地区回流到家乡县城恢复亲代抚育，以更好地适应县城新的生活方式与教育模式。

五、恢复亲代抚育的社会条件

中西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恢复亲代抚育的社会条件。此前，农民工之所以远距离外出务工且无法兼顾子女抚育，正是因为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主要聚集在东南沿海地区，而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隔代抚育的支持又主要位于家乡所在的中西部县域，这使得农民工家庭不得不将家计与抚育拆分在城乡之间。近年来，由于中西部县域承接了大量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县域非农就业机会明显增加。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再跨地区远距离迁徙到东南沿海城镇，而是回流家乡县域就近就业，从而兼顾家庭生计与子女抚育。T县正在承接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人员回流，华炎电子厂的内迁与员工的回流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一）产业转移的兴起

承接产业转移是T县工业发展的突破口。21世纪初，T县工业门类单一，以资源密集型的重型加工制造业为主，一家铝业公司的产值占全县工业产值的80%以上，此外，T县仅有一些农产品加工业。2009年，T县正是为这家铝业公司建设了盘水镇工业园，这是县域工业园建设的开端，T县也由此拉开了承接产业转移的序幕。2011年，T县设立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并在老县城北侧和另一个中心乡镇开发了新的工业园区，一方面将县内已有的农产品加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另一方面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吸引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家回家乡办厂。截至2022年底，T县工业园区共有近200家从东南沿海地区转移而来的企业入驻，逐渐形成了铝材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轻工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和电子制造业五大产业“齐头并

进”的发展格局，提供了2.6万个就业岗位，其中绝大部分就业者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回流的农民工。

华炎电子厂是东南沿海产业转移的代表性企业。它是一家台资企业，1997年在广东省东莞市的村镇建厂。2020年，华炎电子厂所在的村镇进行城中村改造，新厂房租金明显提高，加之大量农民工已返回中西部家乡，东莞出现招工难的问题，人力成本进一步上升。此外，原材料涨价、订单量下降更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企业开始出现亏损的苗头。在这种情况下，华炎电子厂的厂长协同骨干员工开始筹划将工厂向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内地搬迁。

在筹划搬迁的过程中，华炎电子厂的老员工表达了强烈的回乡意愿。厂长是从陕西嫁到T县的媳妇，绝大部分骨干员工也是在工厂工作了10~20年的T县农民。他们的孩子（大到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小到准备上幼儿园的幼儿）几乎都在T县老家由祖辈进行隔代抚育。厂长打听到T县正在筹建一个电子产业园，土地租金每月每平方米仅9元，而东莞最便宜的厂房租金也要每月每平方米18~20元，T县的底薪为每月1680元，也比东莞的每月1720元略低，且工厂的主要产品——被动元器件属于小型轻工业品，搬迁的运输成本并不高更关键的是，若回乡办厂，厂里的骨干员工便能与家人团聚、自己照顾孩子。因此，厂长决定动员他们随工厂迁到T县。对大多数老员工来说，虽然他们常年在东莞务工，但并未在东莞买房安居，社会关系网络也仍以乡缘为主，未曾将东莞视为长期扎根之地。当厂长提出将工厂迁到家乡，且工资收入只比东莞略低时，绝大部分骨干员工都同意了。

这个镇上有很多T县人，有的甚至是同一个村的。我在这里认识的老乡大概有五六十个，租房子在一块儿，聊天也在一块儿，日常生活有很多交集。当时把小孩带到这里上学的只有五六个老乡，大部分人在孩子读小学前都要将孩子送回老家。所以如果工厂迁到家乡，家里有同样的打工机会，我们是很愿意回家的。（20220728 玉秀）

现在县里建工业园后，很多沿海的工厂都搬回来了，很多外出打工的人都愿意回来。虽然他们在外钱挣得多一些，但是照顾不了家里的老人和小孩。（20220728 若妍）

回乡照顾孩子是老员工愿意随厂迁移的重要原因。此前长期的亲子分离使他们对孩子心怀愧疚，回乡工作后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和照顾孩子，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内心的缺憾。因此，当家乡也有类似的就业机会时，即使工资低于东南沿海地区，他们的家庭经济收入会有所下降，他们也愿意回流家乡以便亲自照顾子女。

（二）家庭生计的保障

工厂的内迁也为新生代农民工恢复亲代抚育创造了条件。除约 50 名老员工是从东莞随厂迁移外，华炎电子厂从 T 县招聘了近 250 名新员工。这些新员工大多也有在东南沿海地区务工的经历，为了照顾孩子，他们在更早的时间点回到了县城。县城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极大影响了他们回流县城的时长，有许多人曾经历过回乡与外出的摇摆，进入华炎电子厂有稳定的工作往往是摇摆后的选择。例如，大伟与妻子原本在东莞生活，妻子全职在家带孩子，大伟在工厂打工，在儿子 3 岁时，妻子回 T 县老家生下一个女儿。为了更好地照顾两个孩子并不再与妻子两地分居，大伟于 2018 年底从东莞回到县城，并把妻子和孩子都接到县城生活。他回忆当时的选择时说：

我刚回来时，在县城找不到合适的工厂，就给超市送货，每月工资只有 1000 多元。一个人要养四个人，怎么养得活哦？所以我只在县城待了两个月就待不住了，又去东莞打了两年工。但看着老婆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太吃力，2021 年我又回来了。听说华炎电子厂要内迁到 T 县，我姐姐之前在这个厂工作过，我就托我姐姐联系厂长把我招了进去，每月工资有 4000 多元，我就在县城留了下来。（20220727 大伟）

大伟在外出与回流的摇摆中努力寻找家计与抚育之间的平衡。当孩子数量增加、家庭抚育负担加重时，回流县域寻求父辈的支持是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常见选择。在没有父辈支持的情况下，要维持以亲代抚育为主的抚育方式非常困难，若要维持新生代夫妇的双系抚育则更加困难。教育进城后，隔代抚育面临诸多结构困境，新生代农民工父母回流县域亲自照顾孩子成为家庭越来越紧迫的任务，但能否回流还要取决于县域的产业发展

状况。若县城没有稳定且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农民工仅依靠非正式的临时性就业很难在县城体面安居。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农民工（尤其是丈夫）不得不背井离乡。随着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企业逐步转移到T县，农民务工的工资水平能够保障一个家庭在县城的基本生计，他们通常愿意舍弃更高的工资回流县域以维系亲代抚育。

六、抚育观念的代际革命

新生代农民工恢复亲代抚育，除受中西部县域城镇化的推动外，还受到抚育观念代际革命的驱动。不同于父辈长期在乡村社会的浸润下沿袭着传统抚育观念，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世界中习得了一套流行于中产阶层的密集抚育观念。这一观念将理想的抚育建构为以孩子为中心的、专家指导的、情感专注的、劳动密集的以及花费昂贵的活动（Hays, 1998: 8-9）。这类抚育实践通常以家庭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父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为基础，虽然中西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实力和受教育程度不及城市中产阶层，但他们仍在抚育观念上接受和效仿城市中产阶层的密集抚育，致力于将孩子培养成未来的中产。新生代农民工抚育观念的革新主要表现在科学育儿与陪伴抚育两个方面。

（一）科学育儿

基于对儿童生理和心理的探索，西方发展了一套系统的有关人类生命早期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的儿童医学与心理学，以此为智识基础形成了科学育儿观念。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他们更容易接受科学育儿的知识，信奉科学育儿的理念。他们通过阅读书籍、检索互联网等方式获得了大量有关科学抚育的理念和方法。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父辈的传统抚育观念已经过时。例如，大伟在评价自己常年在家务农的父母的抚育方式时谈道：

我父母思想老土，真带不好孩子。但是他们同龄人中的另一些老人就能够带好孩子，这不取决于年龄，而是取决于思想观念。如果我们把孩子给老人带，老人只管孩子穿暖吃饱。（20220727 大伟）

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父辈沿袭了乡村社会中仅追求吃饱穿暖的低水准的抚育观念，在抚育实践上与城市中产阶层存在明显差距。

第一，父辈对孩子的生理抚育具有明显的随意性。1980年出生的海琴常年在东莞华炎电子厂务工，她的大儿子在一岁大时就被留在老家由孩子的祖父母抚育。海琴谈论孩子的祖父母的抚育过程时说：

孩子喜欢喝酸奶，爷爷奶奶随他爱喝多少就喝多少。这一箱还没有喝完，后面又给他买回来了。后来（我家小孩）两岁时牙齿就烂了，门牙也掉了，我看着真的好可怜……还有，孩子的日常生活没有固定的作息，孩子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小孩中午吃完午饭后睡到下午3~5点才起床，醒来后，爷爷奶奶又赶紧给他零食吃，孩子在晚饭的正餐时间就不愿吃什么了。（20230207 海琴）

新生代农民工则强调生理抚育过程的计划性。科学育儿要求家长理性化地控制孩子饮食、睡眠等日常活动的节律，家长不仅要根据孩子的成长阶段采取特定的喂养模式，而且要时时关注孩子的动态，及时约束孩子的行为。海琴的小儿子于2018年出生，有一段时期放在老家给老人带。在小儿子一岁多时，海琴和丈夫在家乡待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他们与小儿子朝夕相处，对小儿子良好生活作息的养成起到了很大作用。

原本爷爷奶奶说孩子晚上喜欢闹，不睡觉。我们回来后天天晚上8点带他上床睡觉。后来，他到点了就会邀我去睡觉。此前，爷爷奶奶说他每晚都要起来喝牛奶，而跟着我们睡的那一个月只是偶尔才会起来要水喝，一般都是一觉睡到天亮。在家吃饭时，我和老公也会看着孩子，尽量让孩子的进食均匀一些。（20230207 海琴）

第二，父辈对于儿童身体发育之外的心智发展缺乏认知，通常忽视儿童心智的培育。儿童语言习得是心智培育的重要方面之一，父辈对语言教育的忽视导致了许多隔代抚育的儿童出现语言发育迟缓的问题。2021年，海琴和丈夫在小儿子两岁多时随华炎电子厂的搬迁从东莞返回县城，对小儿子在一两岁语言发展的关键期由孩子的爷爷奶奶抚育深感懊悔。

爷爷奶奶只知道做工，很少与孩子进行语言交流。所以小儿子两三岁时，我和老公从沿海回来，（发现）孩子还有很多话不会讲，我们就很担心。他的很多语言是从动画片中学到的，但爷爷奶奶没有意识到孩子可以通过动画片学习语言。奶奶有时睡午觉，就把电视调成静音，午睡过后又忘记把声音调大，孩子就一直在那儿看哑剧。（20230207 海琴）

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儿童的心智培育。以儿童的语言习得为例，新生代农民工努力通过语言交流为儿童创造一个有丰富语言刺激的环境，并将对儿童的语言培育视为一种专门性的抚育活动。2021年，海琴夫妇随华炎电子厂回迁县城后，投入很多时间培养小儿子的语言能力。

为了提升孩子的语言能力，我们很着急，天天和他视频聊天。有时孩子发音不标准，我会教他重复一次，他再重复时就会讲得标准些。本来他还没有到上幼儿园的年龄，我们还是把他送去了幼儿园，因为跟着幼儿园其他小朋友后面学，至少要比在家跟着爷爷奶奶更好。经过一年的训练，他的语言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再去上幼儿园时，老师就说我家小孩这一年会讲好多话了。（20230207 海琴）

由于学龄前的语言能力是儿童知识学习与社会交往的必备基础，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急切，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孩子提供更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孩子尽早习得语言能力。

总而言之，科学育儿观念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兴起和传播，使得家庭中的两代人在抚育观念和抚育实践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父辈在儿童生理抚育上的随意性以及对儿童心智培育的忽视，与新生代农民工所期待的科学育儿相距甚远。新生代农民工迫不及待地要恢复亲代抚育或更高程度地参与到抚育活动中，以便重整孩子生理抚育的秩序并弥补孩子心智培育的欠缺。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加理性化的科学育儿方式也恰恰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适应城市生活的心智品质。他们对抚育活动的精确计划以及对儿童心智能力的精准培育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更加符合儿童的生理与心理的节律性，更是为了培养儿童对身体与情感的控制能力，使儿童能够在未来适应高速运转、追求效率与充满竞争的城市生活。这表明，科学育儿亦是在实践着人的城市化。

（二）陪伴抚育

在以儿童为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抚育手段的理性化与亲密的亲子情感是相互关联的，这种情感的培养在老一代农民工抚育子女时并不突出。因为尚在温饱边缘的家庭首先要通过成员间的分工协作维持基本生存，他们选择优先满足家庭生计的需要而将培育亲子情感置于次要的位置。他们通常在孩子一岁甚至几个月大时就外出务工，还没来得及与孩子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结就彼此分离了。此外，与亲戚、邻居、工友这些熟人社群的交往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他们分给家庭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很少着力培养亲子之间的情感。即使在他们成为祖辈后，也依然会忙于生计与家务，忽视与孙辈的情感交流。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培育亲子情感的意识则明显增强。一方面，这源于生产功能从家庭分离出去后，家庭成了一个更加纯粹的情感共同体，父母与子女之间情感的培育不再被视为是对家庭生计的干扰，而被赋予一种新的价值（阿利埃斯，2013：331）。另一方面，人们比以往更加脱嵌于传统的熟人社区，进入了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充满流动性的城市社会后，需要与外部理性的世界保持必要的距离，倾向于通过与家庭成员建立更为亲密的情感联结来构筑起远离陌生人的屏障（弗农，2017：68-69）。

陪伴，即身体与情感的共在是培育家庭亲子情感的新机制。这对曾有过留守儿童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尤为重要。儿童成为家庭情感投资的对象。新生代农民工父母通过一系列的家庭仪式，如家庭聚餐、睡前故事和生日庆祝活动等来凝聚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和对孩子的爱。例如，1990年出生、一直由爷爷奶奶抚育长大的慕青深感留守经历给自己和父母带来的情感隔阂。自她成为母亲后就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亲自抚育孩子。她没有选择去东南沿海地区务工，而是在县城开了一家美甲店，陪儿子在县城读小学。她在抚育过程中尤其关注亲子陪伴中的情感表达。原本她习惯让儿子在外面吃早餐，以为这是爱儿子的表现，后来一位她很尊重的长辈提醒她，早餐一定不要让孩子在外面吃，外面的早餐既不太卫生，也缺乏营养。这位长辈说的话深刻影响了她，她回忆道：

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坚持每天亲自给孩子做早餐，除非哪天早上我的确非常累，否则不会让孩子去外面吃早餐……我觉得爱本来就是要表达的。（20230809 慕青）

慕青从买早餐到做早餐的行为转变，完全不是经济利益算计的结果，她已经将做早餐和与孩子共进早餐视为表达亲子情感的仪式。正是通过这些日常活动中的具身陪伴与情感表达，新生代农民工与子代培育了更亲密的情感，这赋予了新生代农民工留在中西部县域而非前往东南沿海地区谋求更多经济收入的意义感。

综上所述，强调理性的科学育儿与强调情感的陪伴抚育共同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抚育观念。前者以科学知识为指导，强调在儿童生理与心智发育的不同阶段采取合适的抚育手段，并以理性化的精神内核让儿童发展出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心智品质。后者则以亲子情感培育为目标，陪伴成为父母对自己的伦理要求，家庭成员之间的温情让家庭真正成为远离城市陌生人社会的情感共同体。抚育观念的代际革命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亲代抚育恢复的内在驱动因素。

七、余论

T县众多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县域恢复亲代抚育的图景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宏大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其中省际流动呈现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的模式。这些跨地区远距离流动的人口大多将子代留给家乡的老人进行隔代抚育。近年来，随着国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战略，中西部县域城镇化迅速发展。从东南沿海转移而来的制造业工厂在县域工业园聚集，县域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水平也得到明显提升，吸引了一大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不过，真正驱动他们回流的不只是中西部县域大量非农就业机会的涌现、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更是新生代农民工恢复亲代抚育、与家人团聚的迫切心愿。

县域亲代抚育的恢复受到了外在结构变迁与内在观念革新的双重驱动。外在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教育城镇化与产业转移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城镇化促使承担隔代抚育功能的老人进城后面临生活方式、生计基础与家校共育模式适应的多重困境。另一方面，县域承接大量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县域就近就业、恢复亲代抚育创造了社会条件。同时，抚育观念的革新也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恢复亲代抚育的重

要动力。科学育儿与陪伴抚育的观念促使他们力图打破父辈的抚育规范，既强调以理性的生理抚育和心智培育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又注重以温情的陪伴修复亲子分离带来的情感缺失。归根结底，抚育观念代际革命的背后依然蕴含着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观念的延续。在这种伦理观念的持续影响下，科学育儿与陪伴抚育可看作新时代“父子一体”的观念所展现出的不同于以往的外在表现。

中西部县域恢复亲代抚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生动展现了人的城镇化的渐进性过程。两代农民工在东南沿海地区长年累月地积累财富并受城市抚育观念的持续熏陶，逐渐具备了回归亲代抚育的物质条件和观念基础。如今，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恢复亲代抚育，从东南沿海地区返回中西部县域的家乡，让中西部县域重新焕发了活力。在城乡融合的县域社会中，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抚育地点地理等级的提升以及抚育观念的革新也预示着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培育既不完全脱离乡土、又能适应城市文明的新人，践行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的城镇化。

参考文献：

- 阿利埃斯，菲力浦，2013，《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沈坚、朱晓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段成荣、周福林，2005，《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人口研究》第1期。
- 费孝通，1999，《费孝通文集》第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 弗农，詹姆斯，2017，《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张祝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国家统计局编，2023，《中国统计年鉴202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焦长权，2022，《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金一虹，2009，《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 雷望红，2018，《阶层流动竞争与教育风险投资——对甘肃宁县“陪读”现象的解读》，《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 李龙、宋月萍，2015，《撤点并校背景下的人口流动意愿——来自农村地区的证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2期。
- 李永萍，2020，《中老年周末夫妻：城市化进程中的代际支持与家庭关系调适——基于城郊农村的经验分析》，《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 ，2022，《“一家三制”：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6期。

- 林小英, 2023, 《县中的孩子: 中国县域教育生态》,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刘超, 2022,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策略与发展型家庭秩序——基于“一家三制”的讨论》, 《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
- 刘建娥、凌巍, 2023, 《中国县域城镇化再抉择——社会性流动的重大转向与系统性构建》,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刘守英、王一鸽, 2018,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管理世界》第10期。
- 庞晓鹏、龙文进、董晓媛、曾俊霞, 2017, 《农村小学生家长租房陪读与家庭经济条件——学校布局调整后农村小学教育不公平的新特征》, 《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 齐薇薇, 2022, 《县域教育“供给-需求”匹配视角下母亲陪读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
- 沈原, 2006,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王文龙, 2012, 《中国陪读现象的流变及其社会学解读》, 《南京社会科学》第10期。
- 王旭清, 2022, 《农村进城陪读母亲的母职实践》, 《青年研究》第6期。
- 夏柱智、贺雪峰, 2017,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杨华、雷望红等, 2023, 《县乡的孩子》,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叶敬忠、潘璐, 2008, 《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一晗, 2022, 《教育变迁与农民“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
- 周飞舟、宋丹丹, 2024, 《回乡陪读的母亲们: 城乡融合进程中的家庭与教育》, 《社会发展研究》第2期。
- 周飞舟、吴柳财、左雯敏、李松涛, 2018, 《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社会学考察》, 《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 Hays, Sharon 1998,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Yan, Yunxiang 2018, “Neo-Familism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47(3-4).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颜燕华

spaces provide foreign youth with accessible channels to accumulate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providing basis for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foreign youth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robus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effective capital conversion channel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of young foreigner coming to China, and improve urban inclusiveness.

Keywords: Young Entrepreneurs in China Yiwu Capital Conversion Social Integration

Special Subject on Upbringing and Parenting Styles in Migrant Families

The Restoration of Parental Nurturing in Counties

..... *Ouyang Dufei & Liu Neng (39)*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have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 counties, and their nurturing mode has been restored from intergenerational nurturing to parental nurturing.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T county in central China,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urban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transfer of industrie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ountie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concept of child rearing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mechanisms of the change in the child rearing mode. In urban-rural integrated county society, the increase in the geographic hierarchy of family fostering locations and the revolution in fostering concepts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mply that they are in their own way cultivating a new generation who are neither completely detached from their rural roots nor unable to adapt to urban civilization. In doing so, they are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a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ounty Urbanization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Parental Caring Grandparental Caring Nurturing Concepts